



安场保吉
猪木武德

1 概述 1955—1980 年

以横跨战中、战后两个年代而形成的框架为起码条件，高速增长在 1955 年以后正式地初绽花蕾，并在 60 年代达到顶峰。以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为界线，增长率减至原来的一半，但与欧美各国相比较，日本仍旧保持住了高水准的增长率。于本卷，我们将追溯这一高速增长的花开及其以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首先，在“1 概述 1955—1980 年”一章中，我们将简要地阐述高速增长的兴隆及其降温过程。《日本经济史》（全 8 卷）一书的重点，在于明确指出发端于江户时代的经济社会逐渐转向近代增长的轨迹。不过《概述》重视的是 1955 年至 1970 年经济增长大幅上扬的过程。

1955 年前后，是人均 GNP 恢复到战前（1934—1936 年）的水平因加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回归国际社会，以及所谓“1955 年体制”形成，而为后来的继续增长在国际和国内都做好了准备的时期。“2 1955 年”，应为对这一准备时期的某些事件稍作深入分析的年份。不仅应探讨日本的工业及输出的结构、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产业政策等，而且应叙述包括赔偿东南亚问题在内，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3 增长的过程（1）”为了主要从投入乃至供给方面阐明其后的增长过程，将着重从资源、组织、产业技术方面来探讨增长过程。如果从“获得资源的准备条件”这一角度来观察经历高速增长到面临两次石油危机的期间，则应关注于技术和劳动力是怎样在企业内和产业之间进行分配和组织的。并且，更加具体地涉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转换、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农业的变迁、技术革新、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的特性等问题。

接着，在“4 增长的过程（2）”中，主要从有效需求侧面展望

高速增长的过程并予以评述。探讨的问题包括：民间资本形成的不同产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时日本人在衣、食、住方面呈现出怎样的急剧变化；国际上如何评价其增长；输出对增长有多大贡献；工薪阶层家庭储蓄有什么实质内容等。

针对高速增长时期主要的经济政策，并对其目的、意义、效果加以评估，是“5 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一章的内容。不言而喻，高速增长是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独创、实践带来的。然而，政府在农业、工业组织、中小企业、引进技术、外资、金融市场、财政贸易等一切领域都实施了有关政策，这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这里区分为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来论述其意义及变化。

在最后一章、即“6 关于高速增长的历史考察”中，对高速增长时期发生的量和质的变化，从历史的观点，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评价。赋予日本“近代经济增长”的开端、高速增长的繁荣历史的地位，并就生活水准的上升、所得分配的变化等与诸外国加以比较而后，论述如此急剧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什么样的“扭曲”，生活模式的大幅度变化，引发了怎样一些问题，以确认日本经济在当今世界的位置。

本卷的对象大抵是从 1955 年到 1980 年的情况。不过 80 年代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也有所叙述。



图 1-1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造船工业

一 新时代的开始



1 恢复到战前水平

如前卷结尾所述，日本经济在特需及强劲的消费需求的拉动下，顺利恢复到战前水平。国内资本形成比率，虽尚不甚高，但因 30 年代至战争时期兴建的资本设备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未遭战火之灾而保留了下来，所以，只需投入原燃料及劳动力，即可取得生产的增加。经济增长的难关依旧是原燃料，只要能够确保原燃料，便完全可能实现增长。

表 1-1 国际收支 1951—1955 年

(百万美元)

	输出	输入	贸易收支	特需
1951	1582	1645	△ 64	592
1952	1286	1684	△ 399	824
1953	1281	2044	△ 763	809
1954	1606	2036	△ 430	597
1955	2002	2022	△ 20	557

出处：经济企画厅统计课：《日本的经济统计》上，至诚堂，1964年，第 317—318、324页

尤其是 1955 年，输出增长了 24%，超过 20 亿美元，国

际收支即使除去特需部分，仍接近于均衡（参照表 1-1）。另外，稻米生产取得超过头年约 3 成的丰收，实现了大米的自给。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约增长了 10%，成为战后最好年份之一。一部分官僚、政客产生了日本经济总算达到了自立的自信，说来是不足为怪的。“已经不是战后”，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这种自信。

“已经不是战后”，还包含着另一种不无消极、悲观的意义。而且，从经济史学观点来讲，似乎这种意义更加重要。人均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1955 年已经超过了战前（1934—1936 年）水平，昭和 31 年度《经济白皮书》警告说：“已经不是战后。……通过恢复取得的增长已经结束。今后的增长，将由现代化支撑。”^①直到 1955 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恢复，今后必将进入更加困难的路程，举步维艰。……此时，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已达到顶点，今后可能大幅度下降。

2 国际关系

经济继续增长，但在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已突破战前水平的同时，贸易的恢复却滞后。除去特需的实际输出指数处于战前（1934—1936 年）三分之二的水平；贸易的依存度仅略超过战前的 50% 左右。对美贸易虽恢复到相当水平，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也都表示在实现赔款之前，拒绝签订和平条约；西欧诸国也继续对

^① 经济企画厅编：《经济白皮书——昭和 31 年度》，至诚堂，1956 年，第 42 页。

日本实行区别对待。

作为缺乏国内资源的日本，极需早日复归国际社会，以扩大贸易，实现增长。美国颇为重视日本的技术、生产设备、劳动力在自由世界中的地位，便从侧面支持了日本的愿望。首先，在 1952 年使日本实现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然而，与东南亚各国的邦交正常化，则因赔偿问题未解决，未能顺利实现。赔偿问题的落实，如第 2 章所述，是在同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赔偿谈判妥善了结的 50 年代后半期。

与西欧及其他地区的贸易逐渐正常化，在自由世界范围以内，日本向国际社会的回归，是于 1955 年通过加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大致完成的。临加盟时的多国间关税谈判，有包括美国在内的 17 个国家参加，它们不但与日本之间互换了关税优惠协定，而且达成了以后互相适用贸易最惠国待遇。但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等 14 国因惧怕来自日本的低工资制品占据本国市场，而援引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35 条，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问题，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后，许多国家仍没有停止对日本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恢复邦交的势头，在 1955 年前后也大有增进。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领导层显示出对日关系正常化的热情，1955 年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缓解了全世界的紧张气氛，向和平共处的转化，也为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日本，1954 年上台的鸠山内阁对邦交正常化也倾注了非同一般的热情。围绕北方领土问题进行的谈判进展十分艰难，但

鸠山首相终于进入莫斯科，1956年10月抛开领土问题，签订了日苏共同宣言。由此，日苏邦交暂且实现了正常化，也消除了日本进入联合国的障碍。于是，日本立即申请加入联合国，12月获得了批准。

关于日中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掀起了融解热潮。1955年，中国方面提出了希望就关系正常化有所接触。日本的舆论界也热烈期待关系正常化；双方民间则大规模地进行了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但因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步美国的后尘，所以未能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不久，于同年9月恢复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8年又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国问题才得到解决。

3 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

1955年这一年，在多种意义上，对战后的日本都是一个具有“阶段”含义的年份。以这一年为界标，在其前后数年之间，日本经济的水平及国际环境均有显著变化，第1、2两节对此已有叙述，就国内政治情况、经济体制来说，这一年也是“新环境”整备就绪的年份。现从其“新环境”中选出几个范例考察一下它们的意义。

一是在前一年底，持续了约6年的吉田内阁下野，成立了以“日本民主党”总裁为新任首相的鸠山一郎内阁。1955年4月，在民主党的倡议下，着手准备根据“保守联合”精神成立新党。并在同年11月建成了战后最大的保守新党——

“自由民主党”。这就是一直将政权保持至今的保守党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野的社会党也在同年实现了左右两派的统一。社会党内部围绕着 1951 年媾和问题发生对立，分裂为支持日美安全条约的右派（委员长为河上丈太郎）和反对这一条约的左派（委员长为铃木茂三郎），但在鸠山内阁成立前后，又开始讨论“统一”问题。其背景之一为，全国最大的劳动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为了当时工人运动战略的需要，强烈要求社会党两派团结统一。1955 年 1 月，两派社会党各在其临时大会上通过了“社会党统一”的决议，但是，后来理顺两派纲领的工作困难重重；为了在对日本独立性的认识、日美安全条约的定位、非武装中立等问题上达成妥协，经历了近 10 个月时间。然而，统一的公约终究实现，日本社会党在参众两院皆成为第二大党。

起始于 1955 年的另一个惯例，是在劳资之间交涉的春季斗争。此事起源于该年元月炭劳（煤矿工人）、私铁、电产等民间 6 个行业产业为春季提高工资而结成了“共斗会议”。这意味着总评已由标榜“和平 4 原则”的“政治时代”转移到了“经济斗争的时代”。这一被称为“春斗”的旨在增加工资的斗争，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每年同一时期由属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工会结成行业组织并展开全国规模的统一行动。这时所决定的工资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把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最低工资提高若干，而是各行业按标准制定的平均工资提升。每年开展这种斗争，也成为日本的特征。这一春季斗争方式刚刚问世时，无论按规模还是按产业类别，工资的差距都依然很大，因而春斗方式本身起到了缩小差距的作用。尤其是经过 1960 年的安保斗争以及三井三池争议之后，春季斗争作

为“经济斗争”固定下来，加之当时出现劳动力不足的趋势，消费者物价也上涨，经营者一方也把“超过按期提级的增加工资”视为理所当然的要求而予以默许。从客观上讲，这确实稳定地支撑了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需求。

二 高速增长时代—— 1956—1970 年



1 准备时期

我们已经提及，1955 年是日本经济在国际、国内的诸条件都得到整备，被视为“界标”的一个年份。不仅如此，这一年份在其他一些方面，对战后的日本经济来说也同样是特殊的一年。在物价已完全稳定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出口工业的基础，并实现了年率近 10% 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这一好势头被称为“数量景气”。这种不伴随物价上升的企业收益的增加，带动了进一步的投资，从而导致 1956—1957 年被称为“神武景气”的景气急剧上升。

这一热潮由于国际收支的恶化而告结束。在经济学家之间，不乏增长减缓论者，但到 1959 年又出现了长达 42 个月的，超过“神武景气”的被称为“岩户景气”的长期繁荣时期。这一“岩户景气”引发了“投资引致投资”的空前繁荣，日本的经济力量出现了极大的飞跃。正如被命名为“设备投资主导型”那样，它显示了民间的设备投资强力牵动整个经济的模式。以数字表示，有如下述。

表1-2 GNP 及民间投资的增长
(与前一年度比(%), 实数(1965年时价格))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实际国民总产值对前一年度增加率	9.1	8.0	8.0	5.4	9.2	14.1	15.6	6.4	10.6	13.3
民间设备投资对前一年度增加率	△3.2	39.0	25.1	△4.7	16.9	40.9	36.8	3.4	5.3	20.0

出处：经济企画厅《国民所得统计年报》，1970年版，第86—87页

1955年到1959年的实际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如表1-2所示，大约为8%左右，而年率表现了2位数字实际增长率的是，从1960年到1964年。另一方面，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则从1956年开始，到1960年已经呈现出将近40%的高比率。那末，民间设备投资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其具体状况如何呢？有代表性的是以钢铁第二次合理化计划为首的重化学工业的合理化计划，投资的活跃化和大型化，是5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的特征。依靠这样的现代化投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加工工程的多层化”顺利进展，为60年代的正规增长铺平了道路。

从这一观点而论，不能不说钢铁第二次合理化计划(1956—1960年)、电力发展五年计划、石油化学第一期计划(1958—1959年)等，对横向有关产业的波及效果，是极为巨大且重要的。钢铁二次合理化计划，是以建设生产用于耐久消费品的薄板材料的带钢轧机以及薄板用纯氧气转炉为核心的。而投向钢铁业的资金，通过汽车车身、家电用品的外包装或工作母机等有关产业，成为能使这些产业进行大量生产

的设备投资。对工作母机战后最大的设备投资，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关于工作母机工业的事业所数和发货数，请参照表 1-3）。引发了这种有关产业连锁效应的钢铁第二次合理化计划，主要是利用市内银行的融资执行的，致使日本成为与美国、西德并驾齐驱的钢铁生产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还向这些需要薄板钢材的有关产业，提供了日后进行技术革新时所必需的具有素材性质的基本条件。

表 1-3 工业母机制造厂家的事业所数、
发货数 1945、1951—1966 年

年	事业所数	从业人员数 (人)	发货数 (百万日元)
1945	258	20392	252
1951	82	3437	948
1952	108	3449	1300
1953	98	5948	3523
1954	119	7372	4333
1955	156	9648	7136
1956	166	8028	4633
1957	183	10846	9083
1958	277	17325	20040
1959	328	23156	29661
1960	351	27649	38305
1961	543	41163	67631
1962	708	55146	113975
1963	645	58230	132545
1964	639	59929	128523
1965	595	55847	133098
1966	501	45282	106400

出处：通产省：《工业统计 50 年史》，《工业统计表》（据日本工作母机工业会：《工作母机统计要览》，1981 年）

- 注 1) 1945 (昭和 20) 年，以从业人员 5 人以上的事业所为统计对象
 2) 1951—1958 (昭和 26—33) 年，以从业人员 4 名以上的事业所为统计对象
 3) 1959 (昭和 34) 年以后以从业人员 10 人以上的事业所为统计对象
 4) 1951 (昭和 26) 年以前的发货数栏的数字系产品生产金额

在钢铁第二次合理化计划问世后〔除在先前的第一次合

理化计划（1951—1955年）时跻身于钢铁联合制造厂的川崎制铁公司之外），各公司竞相建设正规的钢铁联合制造厂，引进了大型高炉、带钢轧机、LD转炉等世界最新的尖端设备。同一时期，在石油化学工业方面，也开始了被称为第一期计划的在新开发区进行的联合企业建设。这些都是1955年以后出现的情况。在复兴战后石油产业的决策上，日本采取了“消费地精炼方案”，所以，石脑油（石油精炼工序的半成品之一，相当于汽油沸点范围的碳化氢物质）的有效利用，便成为技术革新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从50年代中期起，已开始大量进口合成树脂，在开发银行融资和引进国外技术的促进下，化学公司、石油化学公司竞相参与了这一领域的角逐。对此，通产省采取了适当控制参与企业数的政策，限定企业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以上，以使企业具备在成本上与国际市场抗衡的能力。其结果，在石油化工第一期计划中，乙烯生产企业只批准了4家。

以这种形式起步的沿海工业地区的联合企业，在1962—1964年的第二期计划中，又有5家参与进来，成为拥有最新成套设备的日本重化学工业的主要支柱，并担当了以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这种产业政策，在地区分布计划的考虑以及预测公害问题后作出的生产系统的安排上，则欠缺部署。这一点将在后章详述。

最后，讲一下到50年代后半期为止的电力事业的情况。从1952年10月起，持续了两个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减弱了煤炭供应的稳定性。但同年开始的石油买卖自由化，却十分自然地加快了由煤炭转向石油的能源换代速度。这也意味着水力资源较为丰富的日本以水力为中心的电源开发，已转

换到“火力为主，水力为辅”的位置，同时将完成“以油为主，以煤为辅”的换位。即，在设立电源开发公司的 1952 年前后，兴建了大型蓄水池式水力发电站，如 1956 年开始运转的佐久间水库，1961 年运转的御母衣水电站等，皆属于其成果。但在计划上，在 1956 年阶段便已采取了将后来的主力投向大容量火力发电的方针。而且，作为国土开发计划获得推进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已将石油火力列为它的一环。

这种能源流体化的革命，是由海外廉价的石油掀起的，低价而稳定的能源供给，是将日本的高速增长支持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为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安保斗争与三池争议

伴随着能源的转换和革命，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也开始了谋求变革的萌动。其一为“安保斗争”，另一为以能源转换政策为背景的“三池争议”。

规定了美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关系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于 1951 年旧金山条约签订的同一天缔结，翌年生效的。该条约的第 3 条规定：驻日美军的武装配备由《日美行政协定》决定。该《协定》在 1952 年 7 月经双方签署生效，详细规定了美军驻日人数，军事基地，裁判权的归属，课税方法以及日本方面的财政负担等。

其后，随着亚洲地区民族解放战争的进展及社会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政府也更加重视关系到远东问题的日本所具有的经济作用，因而倾向于应当响应日本要求修订日美安保

条约的立场。日本国内也有呼声，认为美军并不承担防卫日本的义务，为镇压日本国内的动乱和骚扰美军有权出兵干涉以及驻日美军没有期限规定等均属修改之列。鉴于这些意见，1957年岸内阁设置了重新探讨安保条约的委员会，从1958年夏季起开始了改订安保条约的谈判。所谓“安保斗争”是指从此时起延续到1960年6月批准（自然认可）的反对修订条约的群众运动。

为了理解这一斗争的历史意义，还需从政治史学的立场加以分析，但其参加人数之多（如据估计自然通过前夜的6月18日，集聚在国会周围阻止安保的示威群众竟多达33万人）以及参加阶层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历来的政治斗争所未曾有过的。而且，该条约的批准书交换之后，岸首相立即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了辞职的意愿。

而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的池田勇人，意识到以非公开政治为宗旨的自民党本身，已到了必须向“现代政党组织”体制转变的关头。池田首相在就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推进农业以及各产业的结构改善，这一政策在1960年12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公布于世。池田勇人还说“日本现已步入经济大国行列”，给予国民以新的明确目标。在政治方面，内阁则采取“低姿态”，标榜政治向国民公开。

此外，关于坚持这一安保体制本身的经济意义，还可举出日本与亚洲诸亲美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援助关系得到加强等事例。同时，这一斗争还加速了现有左翼政党的分裂（民主社会党的组建；新左翼势力脱离共产党等），以及“新中间层”参与政治意识的高涨等，推动了新的政治运动的

开展。

在安保斗争造成乱哄哄的人群包围国会的 1960 年春，在三池煤矿，围绕复工问题发生了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的冲突，第一工会的纠察队又与警官队顶撞起来，争议呈现了激化不止的态势。这场“三池争议”围绕三井矿山三池矿业局的裁减人员（包括三矿联提出的 4,580 人希望退职在内的第二次企业整顿案），从 1959 年夏天起一直争执不休。

争议的焦点在于同年未发表的指名解雇的 1,200 余名人员裁减的排序上。虽然在其他的大煤矿有在附加退职金的条件下募集自愿退职者的“合理化”措施，但因涉及积极在车间开展工作的工会活动家被指名解雇，三池争议不仅对三井煤矿的劳资关系，甚至对日本工人运动的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争议的过程中，因煤炭业界、财界人士介入，煤炭工会和总评议会开始进行联合斗争，发展到 1960 年元月末的封闭工厂和进入无限期罢工；同年 3 月工会分裂，第二工会的会员复工，由暴力团挑起的刺杀第一工会会员的事件等也相继发生。7 月取消执行加料斗（存煤槽）纠察的临时处置时，纠察队与强行取缔纠察的警察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此之后，池田勇人在国会指定为内阁首相。

结果，池田内阁成立后最初的重要公务便是处理三池争议。中央劳动委员会三次提出愿为之调解，劳资双方终于接受。达成这一结局的原因是煤矿工会采取了理应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的态度，财界也认为必须制止混乱的政局进一步恶化。斡旋方案接受了事实上的指名解雇，并认定工会在岗位上的斗争确有超出正常范围之处。